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 导论

吴齐林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国新

装帧设计 张世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导论/吴齐林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12-02398-1

I. 中… II. 吴… III. 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292 号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导论

吴齐林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40 千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398-1/F·439

定 价:20.00 元

印 数:00001-0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吉勇夫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导论,是我国高等院校在世纪之交开设的基础理论课。何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对此理论界暂时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本书的作者、从俄罗斯留学归来的国立莫斯科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吴齐林同志认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于这一观点,作者详细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的构成要素、基本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在这一机制下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循环与周转,国家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和管理,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

我认为,吴齐林同志关于何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断言是能够成立的,基于这种认识而设定的研究对象也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①,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是这一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之间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特有的基本矛盾“自己运动”的必然结果,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定和形成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结晶。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人们逐渐被关进这样的思想牢笼:“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采取计划经济模式。谁要是提出异议,谁就是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仅就这种一味地从理念性的政治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的思维方式来看,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基本关系已被完全颠倒了,就像杜林和黑格尔那样,“把头当作脚”,倒行逆施^①。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科学原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断然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为了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对于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而有序的改革。通过改革,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诚如作者所云,“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壮丽日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①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详细论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74页。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必然性,理论界已经做出了深入探讨和广泛阐发,而社会主义市场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市场结构怎么样,运行机制是什么,在这种体制下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循环与周转有什么新特点,新形式?政府在宏观上应当如何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主题。然而,理论界对于这些问题却少有问津。本书的作者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我们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而这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包括哪些内容,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应当如何将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的作者吴齐林同志认为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开设的经济学便是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的,作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成功地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新鲜经验和成功举措融于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构体系。作者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应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要求,成功地将西方经济学的弹性理论转变为企业经营策略;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转变为市场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回答了生产者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问题;运用凯恩斯的宏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回答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作者还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机制、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为了拓展读者的思路,借鉴别国经验,本书最后一章还评析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过程。因此,我感到,本书内容完整,结构新颖,文风朴实,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富有创新;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经济类本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必备手册。

我与吴齐林同志相识已有二十个年头了。1985年初秋,我们在云南昆明参加全国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他风华正茂,代表安徽省委党校在大会上发言,由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便经常邮寄一些学术资料给他。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同我切磋一些学术问题。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行“精神会餐”。吴齐林同志之所以能够对经济学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一是因为他理论基础扎实,相关知识丰富,二是由于他能够做到与时俱进,经常更新知识。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首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视野开阔,善于分析,长于综合,有条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结晶。虽然书中尚有某些有待于进一步切磋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毕竟在这一方面率先开拓了研究的先河。兹值本书出版之际,略陈以上数言,以致祝贺!

2004年10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	(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9)
第三节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17)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的构成要素	(23)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主体	(2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客体	(3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流通媒介	(41)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机制	(4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决定	(48)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政策和市场机制	(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策略	(60)
第四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结构	(72)
第一节 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	(72)
第二节 现代市场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	(80)
第三节 现代市场的竞争结构	(88)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	(100)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	(100)
第二节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源配置	(108)
第三节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	(118)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	(124)
第一节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24)
第二节 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28)
第三节 摆脱农业困境的几点设想	(134)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	(139)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	(139)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行为	(14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152)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	(15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对象	(158)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	(167)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形式	(172)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	(184)
第一节	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和作用	(184)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者主权与消费结构	(189)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资源配置	(195)
第十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	(205)
第一节	经济增长分析	(205)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	(21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	(220)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开放	(228)
第一节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积极意义	(228)
第二节	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目标与战略	(233)
第三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交流的主要形式	(237)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245)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行目标	(245)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25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257)
第十三章	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借鉴	(264)
第一节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	(264)
第二节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	(272)
第三节	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的评析与借鉴	(280)

而,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竟在这破难不堪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现象是否有悖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呢?回答是否定的。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基本矛盾“自己运动”的必然结果

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又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①,在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只要条件成熟就应当爆发革命,只要革命成功了,就应当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革,“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②。在中国,永远不会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和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生产关系方面兼有封建主义、外国买办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等多种性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基本矛盾^③“自己运动”的必然结果。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本该进行一场旨在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主革命,然而,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生得较迟,资产阶级先天不足,且与封建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③ 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基本矛盾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也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但却无意根本摧毁封建制度。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很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大片领土被割让,几十亿两白银流向国外,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血汗为别国的发展做出无偿的牺牲。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既未赶走帝国主义,也未消灭官僚买办阶级。既然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农民阶级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那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座大山”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总代表蒋家王朝,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接收过来的社会生产力虽然十分落后,但是,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一) 无数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准中国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只准中国充当它们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价格昂贵的商品的销售地。鉴于国际资本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二) 我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赖以建立的政治条件: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目标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些政治条件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指出,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在旧社会的母体内进行,而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上层建筑形成以后才能进行。既然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业已形成,那么,在经济基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三) 从我国当时的经济成分的结构来

看,官僚买办资本已占全国的工业资本的60%,占全国的工矿、交通运输等固定资产的80%,人民政府一旦将官僚资本没收过来,改造成为国有企业,也就掌握了国有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能够起到主导作用。这就为整个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生产关系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完整的体系,既然官僚买办资本已被没收为国家所有,那么,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业、商业也应加以一定的限制,采取适当的形式予以改造,以便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商业体系。而农业是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地,也是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循环系统,也应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孤立地看,仅从中国的范围来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确实不够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或者说,没有发展到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丝毫不能发展的地步。但是,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从国际范围来看问题。当我们从国际范围来分析和认识问题时,就可以发现,由资本关系国际化所引起的国际剥削、国际掠夺和强权政治则是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国际化了的资本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是殖民体系。因此,从这种角度看,我国进行的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世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劲旅。既然如此,革命成功以后理所当然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并没有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反,它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造性运用和特殊体现。

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途径

在我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经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的:一是没收官僚买办资本,二是赎买民族资本,三是对个体经济实行合作化。

官僚买办资本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具有勾结关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必须对其实行没收政策。由于所没收的是封建买办阶级的垄断资本,因而此举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由于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是剥夺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因而此举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

运用赎买的方法或公私合营的方法把民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提出过的设想,然而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实行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功地实行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天生就不同于官僚资本,作为民族资本人格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是无产阶级的盟友,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后,又能够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他们所经营的私营工业、私营商业不仅向国家提供产品,而且也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还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因此,我们对于民族资本只能采取赎买的方法或公司合营的方法。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民族资本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如剥削工人和劳动群众、生产无计划、偷工减料、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因此,除了采取赎买的政策,还要采取限制、改造的政策,要把资本家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在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表明我国在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步骤:

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首先在企业外部联合,然后再进入到企业内部的联合;二是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的扩大和积累,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

个体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个人亲自参加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当时,个体经济包括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个体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而我国的个体农业多数都是在土地改革中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夺回土地后才形成的。个体经济是小生产范畴,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而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相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①。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小生产者还会出现两极分化,重新出现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资料者不劳动的奇怪现象。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必须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及时地对小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那些重新丧失土地的农民将会埋怨政府见死不救,另外一些积累了生产资料的农民则会埋怨政府不支持他们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合作化运动。

我们党在引导农民向合作化迈进的初始阶段,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稳妥的政策:(1) 自愿互利政策。自愿,就是不对小生产者进行剥夺,入社、退社皆由其自便;互利,就是一方面承认小生产者之间的利益有差别,不搞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相互之间又有所补益。(2) 典型示范的政策。政府先在个别地区抓一些典型或样板,让群众自己去比较实现合作化与不实行合作化在收益方面的差别,据此再作抉择。(3) 逐步过渡的政策。从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再由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继而再向具有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0页。

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必须承认,这些政策在合作化运动刚开始的头两年执行得还比较好,步伐还比较稳妥。然而,1955年以后,就有一些急于求成、粗制滥造了。原计划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要用3个五年计划,结果只用了5年时间,1957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又骤然跳跃到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接着又在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后来,又开展了历时良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谁若对此提出异议,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实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

三、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进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必须承认,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结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和许多重大项目的建设,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便于统筹安排综合国力,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一个经济、技术都很落后的国度内实行这种单一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顶住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历史的向前推移,这种高度集中、形式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所固有的弊端便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概括地说,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弊端是:(一)在经济理论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没有分开,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没有分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没有分开。因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管理变成了对企业的直接经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搅在一起“打和隆”; (二) 在流通体制上,一律实行按照国家计划规定的牌价和任务“统购统销”,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市场存在,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三)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不能借助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有一度还推行过不要经济核算和流通媒介的“一平二调”。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一切问题皆由政府决定,企业无权决定; (四) 在分配方式上,没有把权、责、利统一起来,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等等。对于这些弊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既不敢分析,也不敢非议,更不敢改革。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时,曾经试图做些整顿和改革,不料,刚刚举步,又被第二次打倒。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科学原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断然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为了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政府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而有序的改革。第一,颁发了一系列搞活市场流通、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解开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内桎梏,而且也打开了通向世界经济的对外门窗。第二,在农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取消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找到了适合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多层次特征的经济形式。第三,在城市,为了扩大无业人口的就业门路,鼓励居民自谋职业,也允许在编人员“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出现了许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第四,为了解决我国有些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允许

中商与外商合资、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政策,于是出现了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这样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的格局,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第五,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价值导向,改革了分配方式上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确立了初次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再分配应当“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公有制企业采取按照所提供的劳动之数量和质量的方式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三资”企业按照提供的生产要素所做的贡献来分配税后利润。第六,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又在城市推行“岗位责任制”、“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岗位责任制”解决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而“税利分流”则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将中央税与地方税分开,使得地方吃国家的“大锅饭”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然而,对于社会的经济资源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来配置呢,还是按照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信号来配置呢?这些问题却成了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困惑。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与探索,人们终于认识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而以上所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恰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于是,在1993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从而又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认真总结国内国际各种经验得出的理论结晶,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基本概念的最初提出到理论体系的形成乃至这种经济体制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长期以来,国内国外的所有政治家和理论家,无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都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画等号,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绝对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只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偏离。这种观点,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的中国已成为不可触犯的天条,任何人都不敢提出丝毫的疑义。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动、组织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把四届人大提出的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重新提到议程。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设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怕再次被打倒的无私无畏精神率先向国外友人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他在回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问话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①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